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3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3 2012
(第11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1)

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条件及影响因素

张永丽[1,2], 谢盈盈[1]

(1. 西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2. 浙江大学 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9)

摘 要: 首先通过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满足的条件;其次利用交叉表进行单变量分析,对需求条件中的显著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通过二元 logistic 方法建立多个自变量的回归模型。综合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受教年限、工作稳定性、净收入、劳动合同这5个变量是农民工市民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 农民工; 市民化; 需求条件;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2)03-0086-09

一、引言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农民工市民化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重大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学术界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及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等方面。首先,关于农工市民化的过程问题,刘传江、程建林、徐建玲[1-2]等人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分为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与城市融合三个阶段;刘小年的研究进一步认为这三个阶段不能只是一种逻辑上的绝对分离,而应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包容的[3]。其次,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研究丰富而全面。李培林等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地位和心理状态,得出收入和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有比较积极的社会转型的态度[4]。大量研究认为户籍制度以及粘贴在户籍制度上的其他相关制度安排,是导致大量农民工工人职业身份、农民身份以及流而不迁的主要原因[5-6]。蔡昉认为中国社保制度门槛高、衔接难,且尚未实现全国统筹等因素导致农民工社保权益难以保障,进而影响了市民化进程[7]。这些制度导致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此外,还有大量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具有典型的二元特征,土地产权的缺陷导致了土地物权的虚置和缺失,同时产权的模糊、价值的低估和补偿标准过低等问题,都制约了农民工土地权益,严重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8-10]。钱文荣等从微观角度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程了分析,他们认为农民工本身的市民化能力和市民化意愿同样影响市民化进程,而市民化能力是制约这一进程的"瓶颈"因素,内在的个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不足则严重限制了他们的市民化能力[11]。罗文英还从社会经济原因和现有城市人口承载力有限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身份转化受阻问题[12]。第三,关于解决农民工市

收稿日期: 2012-04-0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630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09YJA790166);西北师范大学知识与科技创新工程项目(NWNU-KJCXGC-03-35)
作者简介: 张永丽(1966—),女,甘肃会宁人,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农业现代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与农村发展.

民化的途径问题,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改革、制度创新、加大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1,9-10]。其中蔡昉等肯定了农民工市民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强调了户籍制度改革的迫切性[7]。黄祖辉就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以农民身份的"三分离"为前提、农民权益的"四可以"为原则和"四配套"为突破的改革途径,为户籍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更加明确和全面的思路[13]。

总体来看,我国关于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进展,研究内容全面而深入,研究的规范化程度也不断提高。但同时,由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数据获取比较困难且农民工流动的不确定性,使当前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总体上是偏向于宏观的,总体的把握偏向于微观视角,关于农民工本身的发展意愿和市民化的条件等方面的研究比较欠缺。基于这种研究现状,2010 年末至 2011 年初,西北师范大学部分研究生和西北师范大学"三农"问题研究社的成员对甘肃省的 10 样本村进行社会调查,共发问卷 707 份,有效问卷 676 份。在有效问卷中涉及当前有外出劳动力的农户为 629 户,其中有 59 户的家现在居住在城镇中,占了外出劳动力农户的 9.38%,基本上实现了市民化的转变。本文主要是根据这一调查数据,从微观的角度,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满足的条件,并就影响这些条件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对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新的解析。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视角

人的需求在遵循基本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研究特征的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本研究以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运用"马斯洛需求理论",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发展需求等五个方面,综合考察他们的需求状况。

1. 生理需求。这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的第一层,生理需要是推动人类活动的最重要的动力,只有当需要满足达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求才有可能产生激励作用。耕地稀少、劳动力过剩、城乡收入差距大等原因造成了劳动力大范围的流动转移[14]。农民工进入城市面临的首要的问题是生存问题,而生存的核心问题首先是相对稳定的工作和能维持日常开支的基本收入。在生理需求中首先得到满足的是温饱需求,当前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吃、穿问题已基本解决;其次,工作的稳定性、职业技术培训和工资水平上升等方面因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而有所改善;第三,绝大部分农民工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工棚或宿舍中,居住环境恶劣,许多学者认为:在城市中适宜的居住环境已成为农民工生存需求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市民化的难点和落脚点[15-16]。

2. 安全需求。这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的第二层,是人自然属性的需要。农民工进入城市,在城市中从事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但基于户籍制度及因户籍制度所形成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工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在当前的安全需求中,首先得到满足的是农民工的财产安全保障,劳资合同的签订及有关部门的关注减少了非正规部门拖欠工资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并没有完全消除。其次,农民工享受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有一定的改善,但目前并没有建立覆盖全国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且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偏低。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数据,新生代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参保率为 67.7%、77.4%、55.9%、70.3% 和 30.7%,分别低于城镇职工 23.7、14.6、29.1、9.1、30.8 个百分点[17]。最后,由于农民工特殊的身份,他们在进入城市后不能享受城市中对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同时相对偏低的工资水平和不适宜居住的环境以及子女入学难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降低了家庭随迁的可能性即市民化的进程。

3. 感情需求。这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的第三层次,是人社会属性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友爱的需要,二是归属的需要。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和所有的群体一样需要有属于

自己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渴望能够融入城市，但由于当前农民工的劳资合同并没有使其成为城市居民的方法途径，同时由于经济地位、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等方面有较大差距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普遍持歧视和偏见的态度，农民工往往被排斥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和生活底层，以棚户社区为形式成为城乡之外的第三元社区，在社区内部仍凭借血缘、地缘的等传统资源来维持秩序，以特有的方式解决自身的问题[18]。因此，如何改变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改善其居住环境，改变在城市中的生活圈和社交圈，使城市市民真正接受农民工市民化是感情需求中面临的最大问题。

4. 尊重需求。马斯洛认为的尊重需求不仅包括对自身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感觉，而且包括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的需求。农民工在城市中不仅要获得工作上的尊重，包括工作得到认可、工资报酬提高、职业培训机会增加等，更重要的是获得心理上、人格上、社会地位上的尊重。因此，如何做到使城市居民从心里上接受农民工，尊重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使农民工在心理上、人格上、社会地位上真正得到满足，是当前尊重需求中最大的难题。

5. 自我实现的需要是第五层次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是指个人实现理想、抱负、成就，发挥其最大程度的能力，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甚至超越的事情的需要。马斯洛认为人往往在工作中实现自我需要。农民工进入城市，在城市中从事着非农工作，首先保障了其本身和家人在日常生活支出的需要。其次，农民工在工作中通过所形成的新的社会资本，暂时找到了一种身份上的归属感，加大了对城市的好感和融合度。第三，工作上的尊重是对农民工社会价值的肯定，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当前的农民工在受教育水平、职业技能经验等方面有所提高，他们往往把进城务工看成谋求发展的途径，希望在求职过程中有更多的培训机会以实现自我价值的提升，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在现实中“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的事实造成了农民工职业的发展空间小、自我实现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农民工往往被缩影到城市中的非正规部门。因此，在工作机会上平等及职业发展空间的增加是农民工自我实现需求中最渴望的方面。

三、数据选取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选取

1. 因变量的选取：本文的因变量是农民工市民化，目前判断农民工是否完成市民化所采用的具体指标，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采用相关行为主体的迁移意愿即市民化的意愿为因变量，对市民化受阻的情况进行分析[11,19]。黄锟以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能力、进程三项指标同时作为因变量，分析城乡二元制度对市民化的影响[9]。范爱军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城镇化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长期稳定的协调关系，把农民收入作为因变量来研究[20]。从调查的数据来看，农民工的职业状况、经济收入及市民化的意愿、能力等对市民化的进程有一定的相关性。但这些因素只是从个人主观观点出发，严密性和逻辑性不足。本文以“农民工在城镇是否有房”为因变量，主要是基于上述的分析，认为居住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最急需解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同时根据当前国家对城市住房的市民化政策演变为依据，采用二元 logistic 方法，对“有房者”赋值1，认为其完成了市民化的转变；对“无房者”赋值0，认为尚没有完成市民化的转变，是潜在的市民化者。

2. 解释变量的选取：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五个层面上的指标，并根据上述需求层次的分析，将其分为四类。（1）生理需要：居住条件、净收入水平、工作稳定性；（2）安全需求：有无劳动合同、有无工伤保险、配偶是否陪同；（3）感情尊重需求：有无城里朋友、实收工资与预期之差、消费方式；（4）自我实现需求：受教年限、

职业状况、技能经验、非农工龄。

(二)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单因素分析方法,通过将四组自变量分别与因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分析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并运用卡方检验检查这种关系是否显著;然后进行多因素分析,即在交叉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二元 logistic 方法建立有多个自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综合分析农民工市民化需满足的条件中的显著影响的自变量。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单因素分析

1. 生理需求条件与农民工市民化的交叉分析。从表 1 可以看出,居住条件在卡方 0.05 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并没有在 0.001 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居住条件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之一;净收入对市民化的影响呈现出"倒 U 型"的分布特点,并且通过了卡方在 0.001 水平下的检验,说明净收入对市民化影响显著;农民工的净收入是农民工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生活消费价值观念上最重要的表现,净收入越高,农民工有充足的经济支持市民化的进行。工作稳定性上,主要分析了工作变换的次数。根据数据显示,近三分之一左右的市民化者表示工作变换在 1 次以内,相对较稳定;而另一方面,近一半左右的市民化者表示工作变换次数在 3 次以上,工作比较不稳定。而工作变换次数对市民化影响的卡方检验显著($P = 0.000 < 0.001$),说明工作稳定性对市民化的影响较大。

表 1　生理需求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生存需求变量		变量取值	未市民化/%	已市民化/%	样本数及统计检验
居住条件	工棚	1	29.5	37.3	N = 629
	单位宿舍	2	36.3	15.3	$\chi^2 = 10.985$
	租房	3	29.3	42.4	$0.001 < P = 0.012 < 0.05$
	其他	4	4.9	5.1	
净收入	0 元以下	0	4.6	1.7	
	0 ~ 5000 元	1	20.4	10.2	N = 629
	5000 ~ 10000	2	28.7	18.6	$\chi^2 = 24.376$
	10000 ~ 15000	3	24.4	20.3	$P = 0.000 < 0.001$
	15000 ~ 20000	4	12.8	33.9	
	20000 以上	5	9.1	15.3	
工作稳定性(工作变换次数)	0 次	0	6.3	3.4	
	1 次	1	40.7	30.5	N = 629
	2 次	2	35.4	15.3	$\chi^2 = 50.982$
	3 次	3	15.6	37.3	$P = 0.000 < 0.001$
	4 次	4	2.0	11.9	
	5 次	5	0	1.7	

2. 安全需求条件与农民工市民化的交叉分析。根据表 2 所示,有无劳动合同的显著性为 0.05,表示社会保障对市民化的影响不是很明显。同时,社会保障中关于有无工伤保险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安全需求尤其是对保障的需求,虽然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之一,但还最不是重要的条件。原因可能是:农民工进入城市,对城市市民及市民所拥有的权利的敏感度不高,

心理上甚至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这点与王春光对农民工自认为是不是农民身份的调查结果相似[21]：认为自己仍是农民身份的调查者占了样本总量的78.5%。配偶陪同通过了卡方检验0.00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配偶陪同对市民化有显著的影响。配偶陪同是农民工市民化价值增值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家庭随迁的一个重要表现。夫妻双方在城市中生活，有了市民化的共同愿望，这也说明了家庭随迁是当前农民工安全需求中重要的因素。

表2 安全需求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安全需求变量		取值	未市民化/%	已市民化/%	样本数及统计检验
劳动合同	有	1	28.9	16.9	N=629 $\chi^2=3.833$
	无	0	71.1	83.1	$P=0.050$
社会保障（工伤保险）	有	1	21.8	11.9	N=629 $\chi^2=3.172$
	无	0	78.2	88.1	$P=0.075>0.05$
家庭随迁（配偶陪同）	是	1	21.1	42.4	N=629 $\chi^2=13.701$
	否	0	78.9	57.6	$P=0.000<0.001$

3. 感情和尊重需求条件与农民工市民化的交叉分析。根据表3所示，城里朋友对市民化的影响显著，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学术界公认为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有正相关的作用[22-23]。实收工资与预期之差和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两者不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对消费方式的选择上，主要通过农民工在上一层次满足时对下一层次产生的消费，这三种消费方式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一个递进的关系。

表3 感情和尊重需求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社会需求变量		取值	无市民化/%	已市民化/%	样本数及统计检验
社会资本（城市朋友）	无	0	52.3	50.9	
	1个	1	47.7	16.9	N=629
	2个	2	0	10.2	$\chi^2=194.871$
	3个	3	0	22.0	$P=0.000<0.001$
实收工资与预期之差	1000以内	0	7.6	6.8	
	1000~5000	1	37.2	52.5	N=629
	5000~10000	2	29.5	22.0	$\chi^2=6.786$
	10000~15000	3	12.3	8.5	$P=0.237>0.05$
	15000~20000	4	5.3	6.8	
	20000以上	5	8.1	3.4	
消费方式	普通日常消费型	1	71.4	78.0	N=629
	娱乐休闲消费型	2	24.2	15.3	$\chi^2=2.819$
	文化学习消费型	3	4.4	6.7	$P=0.244>0.05$

4. 自我实现需求条件与农民工市民化的交叉分析。表4中，农民工市民化的自我实现需求条件中，受教年限通过了卡方0.00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个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有很重要的影响；非农工龄通过了显著性0.05的检验，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0.001的检验，表明非农工龄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受教育程度和非农工龄是人力资本的重要变量，而人力资本是判断农民工收入水平、市民化能力等正相关因素。职业类型和技能经验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原因，可能是当前农民工的就业主要在非正规部门，以体力活和服务行业为主，对

技能的要求不高,因此农民工群体中的社会分层不明显,对市民化的作用不大。

表 4　自我实现需求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自我实现需求变量		取值	未市民化 /%	已市民化 /%	样本数及统计检验
受教年限	文盲	0	2.1	1.7	
	小学	1	26.8	11.9	N = 629
	初中	2	51.2	49.2	$\chi^2 = 23.209$
	高中	3	14.6	16.9	$P = 0.000 < 0.001$
	大专及以上	4	5.3	20.3	
职业类型	临时工	0	12.5	8.5	
	建筑业	1	27.54	45.7	
	服务员	2	8.1	5.1	N = 629
	一般工人	3	18.6	20.3	$\chi^2 = 10.528$
	技术工人	4	27.4	15.2	$P = 0.062 > 0.05$
	个体及管理者	5	5.9	5.1	
技能经验	有	1	17.7	13.6	N = 629　$\chi^2 = 0.649$
	无	0	82.3	86.4	$P = 0.422 > 0.05$
非农工龄	1 年	1	23.2	15.3	
	2 年	2	25.3	35.6	N = 629
	3 年	3	20.7	6.8	$\chi^2 = 11.220$
	4 年	4	14.8	20.3	$0.001 < P = 0.012 < 0.05$
	5 年	5	16.0	22.0	

(二)多因素分析

在生存需求、安全需求、感情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四组自变量与农民工市民化交叉分析基础上,通过对自变量的筛选,剔除了与市民化关系不大的几个自变量,保留了居住条件、净收入、工作稳定性、家庭随迁、社会资本、受教年限和非农工龄 7 个自变量。

1. 模型构建及分析过程

为了综合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条件及影响因素,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引入卡方检验显著的因变量,构建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农民工市民化需求条件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是研究定性变量和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有效分析工具之一。模型的应变量只有两种选择,并根据事件的发生与否只能取 1 和 0,1 表示事件发生即实现了市民化,0 表示事件没有发生即没有实现市民化。logistic 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ln\left(\frac{p_i}{1-p_i}\right) = \alpha + \sum_{k}^{n}\beta_k x_{ki} + \mu$$

其中 p_i 为农民工市民化的概率,$1-p_i$ 为农民工非市民化的概率;i 为样本的编号;k 为影响因素编号;n 表示影响因素的个数;β_k 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条件的各影响因素的代估参数;x_{ki} 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μ 是误差项。

使用 SPSS 17.0 软件对所调查的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首先将 7 个影响因素使用强制进入法引入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模型的回归结果(步骤 1)。在步骤 1 中的 HL 通过了显著性水平的检验,但在步骤 1 中受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模型的预测效果不好。我们使用向后最大似然比逐步筛选(向后 LR)进行回归,以显著性水平为 0.05、剔除水平为 0.1、置信度为 95%,经过 5 步

筛选,得到一个整体拟合效果较好的模型(步骤5)。在步骤5中的HLT统计量的P值(显著性)为0.414>0.05,说明统计结果不显著;同时-2LL值为275.004,表明该模型的总体拟合度较好。

2.计量结果分析

步骤5中,净收入、工作稳定性、劳动合同、社会资本、受教年限5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检验,说明这些变量是市民化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1)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首先,回归系数为正(0.990),说明社会资本对农民工

表5 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

		B	S.E.	Wals	df	Sig.	Exp(B)
步骤1[a]	居住状况	-0.030	0.195	0.024	1	0.877	0.970
	净收入	0.308	0.123	6.314	1	0.012	1.361
	工作稳定性(工作变换次数)	0.700	0.178	15.432	1	0.000	2.014
	劳动合同	-1.399	0.427	10.729	1	0.001	0.247
	家庭随迁(配偶陪同)	0.446	0.349	1.638	1	0.201	1.562
	社会资本(城市朋友)	0.943	0.221	18.174	1	0.000	2.569
	受教年限	0.913	0.192	22.488	1	0.000	2.491
	非农频工龄	0.038	0.129	0.085	1	0.771	1.038
	常量	-7.157	0.929	59.373	1	0.000	0.001
步骤5[a]	净收入	0.330	0.120	7.530	1	0.006	1.390
	工作稳定性(工作变换次数)	0.764	0.167	20.959	1	0.000	2.147
	劳动合同	-1.415	0.421	11.321	1	0.001	0.243
	社会资本(城市朋友)	0.990	0.215	21.266	1	0.000	2.692
	受教年限	0.902	0.187	23.177	1	0.000	2.465
	常量	-7.176	0.715	100.747	1	0.000	0.001

市民化的影响为正向作用。其次,边际系数(2.692)说明农民工在城市中每增加一个朋友,市民化的概率将是原来的2.692倍。社会资本不仅是市民化能力的变量,也是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因素,它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合状况。

(2)受教年限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首先,回归系数为正(0.902),说明教育对市民化的影响为正向作用。其次,边际系数为2.465,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教年限每增加一个层次,就会使市民化的概率增加2.465倍。这一结论与学术界达成的共识想吻合,即教育是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市民化水平的主要因素。

(3)工作稳定性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首先,回归系数为正(0.764),说明工作变换频率对市民化的影响为正向作用;其次,边际系数为2.147,说明农民工每增加一次工作变动,市民化的概率将增加原来的2.147倍。这与预期的方向相反即工作越稳定反而降低了市民化的速度,但进一步观察发现,农民工更换工作,主要原因是对之前工作的工资水平、职业发展前景及生产生活条件不满,更换工作是为了找到理想中的工作;另一个方面,更换工作,有了前工作技能积累,增加了找到理想工作的概率。

(4)净收入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首先,从模型的结果来看,回归系数(0.330)为正,说明净收入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为正向作用。其次,净收入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边际影响为1.390,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净收入每增加一个层次,市民化发生的概率将是原来的1.394倍,即市民化实现的可能性增加39.4%。这一结论也论证了当前学术界达成的广泛共识,即收入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条件。其中,净收入更能准确的反应农民工市民化的能力和意愿,是测量农民工在

城市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

(5)劳动合同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首先,劳动合同的回归系数为负(-1.415),说明劳动合同的签订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概率,对市民化的影响为反向作用,这与预期的方向相反。其次,合同对市民化的边际影响为 0.243,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签订一单位的劳动合同,市民化的机会比率将相应的降低 24.3 倍,原因可能是中国目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了,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24],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使劳动合同的签订保障了雇工单位的权利,更多的显示出工资"刚性"的一面;把劳动力固定在固定单位和工资水平上,阻碍了劳动力追求更高收入的权利。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表明,当前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生存需求、安全需求、尊重和感情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同时存在于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过程中,这与马斯洛认为的人的需求是按照一个递进式的需求关系不同。实证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层次很可能是跳跃式的发展。根据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条件,建议今后推进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进展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满足农民工的需求条件。

首先,社会资本是加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第一,中国向来就有比较强调社会人际关系的文化传统,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市场分割的存在,社会资本在市民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极其重要:农民工首先通过社会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寻找工作,再通过新型社会资本积累更换工作,工作的更替满足了农民工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在市民化过程中,有关部门应积极宣传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纠正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妖魔化"的观念,缓解双方在城市中的矛盾,促进城市的融合。

其次,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是限制农民工收入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低收入又会影响农民工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资,导致农民工陷入"贫困恶性循环"之中,减缓了市民化的进程。因此,政府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政策应考虑到教育的影响作用,把教育纳入农村发展和城市化的战略之中。此外,针对工作变换次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作用,政府应制定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动者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流动者加强职业培训的政策,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及市场竞争力,增强劳动者的法律意识。

第三,流动者工作更换次数的增加及劳动合同的负向作用从侧面反映了农民工对工作状况的不满,对法律维权的不懂及对工资水平不公的直接反抗。从长期来看,工作的稳定性是农民工收入提高、经验积累、合法权利保障的重要前提。因此,政府要改善这种情形,首先应加强农民工的法律敏感度,积极发挥工会保障劳动力获得合法权利的作用,减少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摩擦,逐渐加强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性,在流动中定居下来,这是农民工市民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第四,收入是农民工最重要的生存保障,是市民化能力的主要表现。就目前来看,为满足农民工的生存需求,提高市民化的速度,相关部门应通过各种措施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中"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同时应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措施,保证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需求。

参考文献:

[1] 刘传江,程建林. 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J]. 经济学家,2009,(10):66 - 72.

[2] 刘传江,徐建玲. 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6 - 10.

[3] 刘小年. 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问题与突破[J]. 经济问题探索,2009,(9):57 - 61.

[4] 李培林. 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分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 李培林,李 炜. 农民工在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J]. 社会学研究,2007,(3):1-17.
[6] 王春光. 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J]. 社会科学研究,2006,(5):107-122.
[7] 蔡 昉. 如何进一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2):85-88.
[8] 张合林,郝寿义. 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制度创新及政策建议[J]. 中国软科学,2007,(2):28-40.
[9] 黄 锟. 农村土地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与制度创新[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2):5-12.
[10] 汪阳红. "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2011,(34):24-37.
[11] 钱文荣. 家庭式迁移背景下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对浙江省17位农民工的访谈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61-69.
[12] 罗文英. 农民工身份转变的障碍及其出路[J]. 农村经济,2011,(3):116-119.
[13] 黄祖辉. 论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J]. 农村经济,2011,(6):3-5.
[14] 蔡 昉,白南生. 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5] 盛来运. 农民工的城市化及其政策建议[J]. 中国统计,2010,(5):5-11.
[16] 金三林. 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框架[J]. 中国房地产金融,2010,(8):16-20.
[17] 吕国泉,等. 2010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N]. 工人日报,2011-02-21(2).
[18] 王德强,贺佐勇. 论和谐社会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建立[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4.
[19] 王桂新.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 人口与发展,2008,(1):3-23.
[20] 范爱军,王丽丽. 我国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证分析[J]. 山东社会科学,2007,(3),79-83.
[21]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科学研究,2001,(3):63-76.
[22] 刘传江,周 玲.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 人口研究,2009,(5):12-18.
[23] 赵立新. 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市民化[J]. 社会主义研究,2006,(4):48-51.
[24] 蔡 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2010,(4):4-13.

The Demanding Conditio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Urbanization of Farmer Workers

ZHANG Yong-li[1,2], XIE Ying-ying[1]

(1.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th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2. *Center for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9, *China*)

Abstract: The urbanization of farmer workers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di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 of farmer workers through Maslow's hierarchy theory; Secondly, we make uniariate analysis with cross table, and analyzes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in the demanding condition; Finally ,we establish more independent variables of the regression model through the binary logistic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cial capital, education, work, net income and labor contract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urbanization of farmer workers.

Key Words: farmer workers; urbanization; demanding conditions; influence factors